

【理论研究】

#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跨学科轨迹

胡全生

**【摘要】**时至21世纪,女性主义叙事学“依旧不是一种单一或说独特的叙事学工程”,而是一种跨学科叙事学工程。它的发展轨迹,是在跨学科中诞生、在跨学科中发展、在跨学科中壮大的轨迹,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跨学科中诞生阶段——性别介入,进入酷儿研究阶段——酷儿兴起,跨学科中拓展阶段——交叉性深化,跨学科中壮大阶段——具身认知拓展。它的未来,或如兰瑟所希望的,能够“随着身体以新的、挑战的方式自行介入”,“来点变革”,或如其文的副标题所示,给女性主义叙事学来点“具身叙事学”。

**【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学;发展轨迹;跨学科;具身认知

**【作者简介】**胡全生,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叙事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

**【原文出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广州),2024.1.38~5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的翻译与研究”(19AWW001)。

从1986年苏珊·兰瑟(Susan Lanser)发表《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算起,女性主义叙事学走了将近40年的历程。回顾一下它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它的发展轨迹,是在跨学科中诞生、在跨学科中拓展、在跨学科中壮大的轨迹,可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跨学科中诞生阶段——性别介入,进入酷儿研究阶段——酷儿兴起,跨学科中拓展阶段——交叉性深化,跨学科中壮大阶段——具身认知拓展。

## 跨学科中诞生阶段——性别介入(1986—1995)

女性主义叙事学,原本就是“女性主义文评与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的产物”,它一开始就是“一个发展势头强劲的跨学科流派”(申丹、王丽亚,2010:194)。在《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中,兰瑟开篇即说,“叙事学对女性主义批评影响甚微,同样也忽视了女性主义的叙事见解”,而且“非常明显的是,叙事学领域实际上没有哪部/篇著述考虑了性别”。因此,兰瑟提议“重写叙事学”,否则这叙事学就“不足以描述女性文本”,也就“不足以描述男性文本”(Lanser,1986:341,343,346)。接着,兰瑟具体分析了女性主义批评、传统叙事学和女性主义叙事学。就此,我们不妨列表如下(正负表

示其主张与否):

女性主义批评、传统叙事学和女性主义叙事学对比表

批评主张 \ 批评方法	女性主义批评	传统叙事学	女性主义叙事学
政治批评	+	-	+
(叙事的)普遍规律	-	+	-(?)
(叙事的)意识形态	+	-	+
语境	+	-	+
性别作用	+	-	+
符号性	-	+	+
模仿性	+	-	+

从表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女性主义批评与传统叙事学背道而驰,但是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却接纳了二者各自的主张,拧成一股绳,唯一存疑的,是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否也主张寻找叙事的普遍规律。不过即使去寻找,也未必能寻找到;即便寻到了也未必是普遍存在的,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普洛普在童话中所寻得的功能,放到有些童话,比如英国的卡特的《血腥密室》,美国的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塞克斯顿的(诗)《灰姑娘》,在这些改写的童话中,恐怕就难以见到普洛普所寻得的功能了。

1986年,罗宾·沃霍尔(Robyn Warhol)也发表了《建构吸引型叙述者理论》一文。文章同样呼吁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虽然不像兰瑟的文章那么明目张胆。文中,沃霍尔首先区分疏远型叙述者和参与型叙述者,然后,通过考察众多文学作品中的参与型叙述者和疏远型叙述者,她看到了作家的典型做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是否直接称呼受述者的名称;(2)直接称呼受述者的频率;(3)提到受述者时进行反讽的程度;(4)叙述者对待人物的立场;(5)叙述者对叙述行为的内隐或外显态度(Warhol, 1986: 813-815)。

这两篇文章的共同点是,都“呼吁性别意识诗学”(Warhol & Lanser, 2015: 6),都在思考“研究性别文化构成语境”(Warhol, 1992: 6; 1996: 21)。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二者都没有正式界定女性主义叙事学。等到1992年,我们才能看到沃霍尔(Warhol, 1992: 5)说,“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性别文化构成语境中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提供了一种方法”。大概如此措辞还不算是正式的定义,故而在1996年,沃霍尔(Warhol, 1996: 21)正式界定道:“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性别文化构成语境中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在2005年,沃霍尔为《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撰写“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词条。按理,她应该重复这一正式定义,但实际上却没有那么做,只说:“女性主义叙事学系统地研究故事和话语,眼睛盯着性别差异。依据其研究方式,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可能注重作者性别、作者(意图)读者性别、真实读者性别、人物性别、叙述者性别和/或受述者性别。女性主义叙事学包含理论与实践两部分,干预中性叙事模式,并对个体叙事文本展开有意识的性别阅读”(Warhol, 2005: 161)。并且强调:“女性主义叙事学坚持将叙事置于历史和文化语境”(Warhol, 2005: 162)。

请注意,这里“性别”“文化”和“语境”,都已超出了传统叙事学的范畴。无怪乎,有些批评家把女性主义叙事学视为“语境主义叙事学”(申丹,等, 2005: 205; Nünning, 2003: 250)。也无怪乎,在所有批评家眼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最齐心协力的试

图”,就是“把性别当作叙事理论分析的中心范畴”。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将叙事理论和性别研究结合起来的任务依然在进行。因此可以预见,叙事理论将继续受到性别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不断出现的新关注的影响”(Allrath & Gyymnich, 2005: 197, 198)。

### 进入酷儿研究阶段——酷儿兴起(1996-2005)

“不断出现的新关注的影响”当然不止一种,而是有多种,其中之一便是酷儿研究。起初,女性主义叙事学把性别问题当成女性主义理论的“基本目标”(Falx, 1990: 40)。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性别问题上,“‘酷儿’一词几乎神奇般地活跃于大街小巷和皇皇学堂”(McGarry & Haggerty, 2007: 1)。刚开始时讨论性、性别和性取向之间的区别时,女性主义叙事学认为“性”是生理概念,而“性别”为社会概念。随着讨论的深入,尤其是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理论介入,女性主义叙事学家意识到,除了“性”和“性别”之外,还有个性别角色或说性别操演问题,这就引出了一个“跨性别”问题:在跨性别人物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性别的表演性。于是便出现了“酷儿”一说。

黑姆斯-加西亚2013年在《女性主义研究》发表了《酷儿理论之后是什么?酷儿族和土著研究》一文<sup>①</sup>。文中,他探讨了酷儿理论的形成,即酷儿族和土著研究。他回顾了自己与其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的很多对话,提到“结果竟成了酷儿族和土著研究果园生长的种子”,酷儿族和土著研究也就应运而生:它“完全得益于有色妇女和土著女性主义”,“诞生于90年代之历史时刻特有的事件和矛盾”(Hames-García, 2013: 385)。

虽然“酷儿”一词有同性恋的意思,但它绝不是单指同性恋,它还包括性少数者,受异性恋霸权压迫的群体,如双性恋、跨性别、变性者。说“酷儿”实际就是想废除性别的二元对立,不区分同性恋和异性恋、男子气和女子气。兰瑟1986年提出《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时似乎通篇都没有提到“酷儿”一词,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她在1995年写下《性别化叙事》

“Sexing the Narrative”),次年此文收录在梅兹主编的《含混的话语》,但标题改为《酷儿化叙事学》(“Queering Narratology”),而且内容有很大的改动,基本上算是两篇不同的文章。它们都讨论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的《写在身体上》,因为这是一部兰瑟说的“酷儿小说”(Lanser, 1995: 93; 1996: 255)。两篇文章都强调性、性别和性取向都是叙事学的重要元素(Lanser, 1995: 90; 1996: 251)。此三者对读者研究文本叙述者和隐含读者间的关系很重要,对判断叙事的可靠性也很重要,而且还为语境诗学提供了有力的论据(Lanser, 1996: 254, 256, 258)。

兰瑟自己还提到酷儿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戏剧性的兴起。在她眼里,“酷儿”一词在叙事研究中至少有三种方式:(1)分别命名非异性恋规范的性身份;(2)解除性欲和性类别;(3)超越或解构类别和二元对立的批评实践。她还指出,“这些方式以不同的方法不仅挑战叙事学‘本身’,而且还挑战女性主义叙事学”,而“酷儿叙事理论的基本关注点,是聚焦于叙事是不是绝对的异性恋规范性的,还是反过来,是否可以是‘酷儿化’的”(Lanser, 2014: 213-214)。

2018年,兰瑟在《文本实践》杂志发表《酷儿化叙述声音》(“Queering Narrative Voice”),再一次详细强调女性主义叙事学的酷儿化问题。首先,她指出《牛津英语词典》(OED)未收录“酷儿”(queer)用作动词的三种学术上的用法:(1)非异性恋规范性性别、性和性取向;(2)瓦解或解构性别、性和性取向的二元对立范畴;(3)拒绝它的类别、二元对立或规范,以此来瓦解或解构实体。她注意到,尽管“酷儿”常用作形容词,但“后结构主义概念”的使用却更广,甚至藉此“意味‘解构’看似‘正常’或‘事物的自然秩序’,或者使之‘陌生化’”(Lanser, 2018a: 924)。兰瑟说写本文的意图就是讨论“酷儿”作为动词的三种含义。但这不是她“第一次涉足酷儿叙事学”,因为在1995年和1996年她就已经发文讨论了。在1995年的文章中,兰瑟想象着可能出现酷儿叙事学;在2015年,兰瑟撰写《建构(更酷儿和)更加兼容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

文,继续关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酷儿问题;在2018年的《酷儿化叙述声音》一文中,她觉得“尽管酷儿文学研究广度和深度很大,但酷儿叙事学本身依然发展得不够,它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关系依然探索得不够,对叙事学的潜在贡献还未见具体。本文把叙述声音用作一面透镜,来探索酷儿叙事学和女性主义叙事学之间的不和谐,在构建理论框架的过程中促进共同目标。文中我取‘酷儿’为词典中少见的含义之一:探索”(Lanser, 2018a: 925)。从一定程度上说,此文是兰瑟对自己在《叙事权威》(Fictions of Authority, 1992)中就“叙述声音”的讨论的进一步深化。所以,兰瑟在性别的介入中加入酷儿理论,绝不是要放弃性别介入,而是要建构多些酷儿、更加兼容的女性主义叙事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性别介入”当中,女性主义叙事学将“酷儿”介入其中,是祸是福尚难断定。诚然,“酷儿”介入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性别二元论有一定的解构作用,但是“酷儿”本身隐含同性恋之义,涉及双性恋、跨性别、变性者。如果把“酷儿”研究当作“性别”研究之核心,那就可能失之偏颇,忘记了女性主义叙事学本身就是种政治行为,忘记她的“社会变革议程”(Knutson, 2000: 36),因为要“变革”的是所有妇女所承受的不平等,而非仅仅是少数人所承受的不平等。

#### 跨学科中拓展阶段——交叉性深化(2006-2017)

另一种“不断出现的新关注的影响”是“交叉性”。随着性别研究不断深入,视野不断扩大,研究者不仅认识到性别须与性和性欲(sexuality)分开而论,而且性别还与身份相关,而身份却具有多元维度,与诸如阶级、国籍、历史、地域等密切相关。这就是“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这一概念的确切所指。1989年,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撰写《消除种族和性的交汇边缘》一文时提出“交叉性”,用它来指涉多元身份,包括性别、种族、阶级、族裔、国籍、性别倾向、宗教、年龄,甚至身体与大脑障碍和身心健康与否。克伦肖是位黑人妇女,获得哈佛法学院的司法博士学位。文中,她以刑事案件来说事。她

认为黑人妇女受压迫是多方面的,黑人妇女不仅受到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还受到其他歧视,包括女性主义理论排挤黑人妇女,这种矮人一等的体验是交叉性的。为此她提出,“由于交叉性体验大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总和,任何不考虑交叉性的分析都不足以讨论黑人女性矮人一等的特别方式”(Crenshaw, 1989: 140)。所以,认真对待交叉性是有“意义”的(150)。在1991年的《标记边缘》一文中,她确立了三种交叉性:结构交叉性、政治交叉性和表现交叉性(Crenshaw, 1991)。

客观地说,“交叉性”这种思想早就有之,可追溯到1851年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的演说《难道我不是女人?》(“Ain't I a Woman?”)。到20世纪下半叶,黑人妇女就问“难道我们不是女人?”(“Ain't We Women?”)。20世纪90年代,“交叉性”这一概念迅速流行,运用于多个领域,除文学批评,尤其是女性主义批评外,还运用于政治学、教育等。但是,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来说,“交叉性”的运用主要还是21世纪头十年的事。这从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可见一斑。

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兰瑟公然“主张‘交叉性’本身是项叙事工程”,是在2010年的《我们到达了那里吗?》一文里提出的(Lanser, 2010: 32)。文中,她想回答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否已达到其目的。首先,她对20世纪80-90年代和21世纪初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做了粗略的总结,将先前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实践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即交叉性女性主义叙事学。她认为,这一交叉性工程“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对叙事学来说而且还对叙事本质来说,是尤为独特的方式,用来图示叙事模式,也被叙事模式所图示”(Lanser, 2010: 35)。在兰瑟眼里,“交叉性”是“美国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比喻”(Lanser, 2010: 34)。因而女性主义叙事学要有性别介入,要研究女性身份,就不可不研究交叉性,不可不探究女性身份的社会定位。就“我们到达了那里吗?”这个问题,兰瑟的回答是既达到了又尚未达到,因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目的不是变动不居的,而是移动的。

因此,为实现其目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尚需继续努力,而兰瑟当时给出的努力方向,就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交叉性未来”(Lanser, 2010: 40)。

此后,兰瑟多次提出交叉性思维。如2014年她说,“交叉性思维拒绝认为性别或性取向能预测或预言的叙事学。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其开始的前提通常是采用演绎法,但交叉性叙事学却不采用演绎法,而是从诸多不同的文本事例中来仔细研究,力求达成叙事学理论”(Lanser, 2014: 212)。次年,兰瑟写下《建构(更酷儿和)更加兼容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指出,对叙事学来说,交叉性“尚未完全开发”,因此她“呼吁交叉性实践”,因为“酷儿叙事学同样要求交叉性关注”。她告诫说,“不仅承认叙事实际就是交叉性的,而且也承认交叉性实际就是叙事,这可能跨文类和跨学科地提升了叙事学工具与方法的价值”(Lanser, 2015: 26)。

客观地说,交叉性理论远比酷儿理论出现得要早,但在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中,交叉性理论较之酷儿理论似乎要晚。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就交叉性的认知不能统一,有些人认为交叉性是种理论,另一些人认为它是个概念或启发式手段,还有些人认为它是种用于女性分析的阅读策略。比如在克伦肖看来,交叉性是“交叉口”,在妮娜·尤瓦尔-戴维斯(Nira Yuval-Davis)看来,交叉性是差异轴,而在多特·斯唐纳斯(Dorthe Staunæs)看来,交叉性却是动态过程(Davis, 2008: 68)。就交叉性的这类辨别,纳什曾用“交叉性战争”来形容,说“几乎所有关于交叉性的东西都被争论,其历史、其起源、其方法、其功效、其政治、其与身份和身份政治的关系、其中心隐喻、其司法取向、其与‘黑人妇女’和黑人女性主义的关系,无一不是如此”(Nash, 2017: 117-18)。

### 跨学科中壮大阶段——具身认知拓展(2018-至今)

2018年,丁南和沃霍尔(Dinnen & Warhol, 2018: 1, 2)这两位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合编了《爱丁堡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导言”中,她们指出,《指南》“抓住了当代叙事理论和叙事学的现状,展示了该领域发

生的迅速变化”，“代表了最前沿的思想，强调了新的发展”，讨论了“十年前不曾预料到的叙事理论问题”。该文集共分6个部分：(1)叙事的大脑中心论和认知论；(2)情境叙事理论；(3)数字叙事理论；(4)电视、电影、漫画和绘本叙事理论；(5)反模仿叙事理论；(6)叙事的哲学论。其中最为新颖的，笔者以为当是第一部分，它把具身认知论纳入叙事学，尤其是纳入女性主义叙事学，据此有理由认为，这标志着女性主义叙事学已拓展到具身认知。在丁南和沃霍尔的眼中，《指南》“试图——假如不是完全抹除——叙事理论：核心概念和批评辩论”中四种叙事研究方式<sup>2</sup>所划分的界线，用许多事例来阐释它们既复杂又互补的研究途径”。此外，六部分中的文章也能“出现在其他部分”，因为“这种重叠是有意为之”，而各部分如此标题，“仅仅是出于实用”(Dinnen & Warhol, 2018: 3)，这一点从第二部分中的第三篇文章即可看出。该文由兰瑟所写，题曰《至死不渝：具身叙事学》(“Till Death Do Us Part: Embodying Narratology”)。兰瑟开篇指出了一种现象，即叙事学忽视了具身研究，其具体表现如下(Lanser, 2018b: 117-118)：

(1)《叙事学活用手册》(*The Living Handbook of Narratology*)中的68个词条，只有大卫·赫尔曼(David Herman)的“认知叙事学”<sup>3</sup>涉及具身；

(2)2005年的《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未见具身词条，只在参考书目中偶尔匆匆一现；

(3)同年的《叙事理论指南》(*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和2010年《后经典叙事学》(*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在其索引中均无具身术语；

(4)与此相对照，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1996年出版的《建构“自然”叙事学》(*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开篇即言“人的具身框架”是体验性的“必要条件”，这反倒令人吃惊；

(5)时至2012年，虽然认知叙事学大致关注到赫尔曼所说的“组织和理解体验领域的方法”，因为它们植根于人的具身存在，故或可在不同的叙事中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但是这并不是该领域所强调

的重点。

(6)经典叙事学虽然特别关注聚焦，可热奈特却说聚焦不甚涉及身体；

(7)叙事学中阅读概念也倾向于离身，所以在《痛快哭一场》(*Having a Good Cry*, 2003)中，沃霍尔的提醒很重要：“阅读总是存于身体，和身体发生联系”；

(8)丹·彭迪(Dan Punday)早在2003年就提出，要建构“身体叙事学”，这一主张至今依然大致准确，因为“叙事概念几乎完全丧失对身体感兴趣”；

(9)兰瑟自己的《叙事行为》(*The Narrative Act*, 1981)和《虚构的权威》(*Fictions of Authority*, 1992)也没有把身体当作理论场所；

(10)可以说，女性主义叙事学，或许也包括一般的叙事学，和早期的女性主义批评和反种族主义一样，分享一种笛卡尔二元论，推崇心理，贬低身体，视之为面对植根于身体不平等的文化政治时坚持思想平等的一种方式，甚至在2015年，在兰瑟和沃霍尔主编的《解放了的叙事理论》(*Narrative Theory Unbound*)中，具身方面的参考书目也很少，尽管苏·J·金(Sue J. Kim)和希拉里·丘特(Hillary Chute)分别谈到“具身主体”和绘本叙事“认真对待身体的文本性”。

在这一现象中，只有(4)(5)(7)(8)不同程度的认可具身认知，其余基本不涉及或忽视。因此，兰瑟说她这回要在这篇文章中“认真对待身体”，不是以她先前思考叙事学的方式，而是用苏·金说的“具身主体”的方式，来“探究身体如何出现于女性主义的、酷儿的、历史的、(后)经典的叙事学”(Lanser, 2018b: 118)，换言之，就是要行之于女性主义具身叙事学。

在这篇文章里，兰瑟将凯特·肖邦(Kate Chopin)的短篇小说《一小时的故事》用作案例来分析。故事的女主人公因丈夫丧命于火车相撞事故，先大悲，后大喜，终猝死。这个故事，兰瑟曾在她1981年的《叙事行为》中讨论过，对女主人公的身体“不曾张扬”，只是“含蓄地谈论”，说她“先是‘心神不安’、筋疲力尽，然后呆若孩童，最后读者知道她年轻、异常强壮、精神备受压抑”(Lanser, 2018b: 124)。当时的做法，纯然是“小试身体思维”。“要是现在”，她就可能：(1)“借

用赫尔曼和马可·卡拉乔洛(Marco Caracciolo)的著述,来强调作为时空运动的聚焦物质性”;(2)“从身体上把握故事人物体系,探究身体是如何与其他部分产生联系”;(3)“询问运动的身体如何为情节提供动力”(Lanser, 2018b: 125)。文章结尾时,兰瑟说道:“我想知道,用身体书写而不是在身体上书写,能不能在学术写作方法上也来些变革……随着我变老,随着身体以新的、挑战的方式自行介入,我想知道学术研究会怎么样,如果我们都是通过我们身体存在的意识来写,通过我们的痛苦、快乐、狂喜、悲剧和死亡来写,不是通过关注它们,而是通过它们来关注。不过,如果这样的话,那是另一个故事了”(Lanser, 2018b: 129)。兰瑟的这篇文章,如其副标题所示,是呼吁女性主义叙事学应该开展“具身叙事学”研究。

兰瑟的这一呼吁,在卡琳·库科宁(Karin Kukkonen)的一篇文章中可听到回声,题曰《移动的目标:认知叙事学与女性主义》(“A Moving Target—Cognitive Narratology and Feminism”),见于2018年《文本实践》杂志的专刊。该专刊的“导言”,即《女性主义和酷儿叙事学》(“Futures for Feminist and Queer Narratology”),是托里·杨(Tory Young, 2018: 913)所写。她认为,时至21世纪,“女性主义叙事学依然不被视为单一或说独特的叙事学工程”。他举的例子是2011年格雷塔·奥尔森(Greta Olson)主编的文集《当前叙事学趋势》(Current Trends in Narratology)。该文集就不提女性主义、性别或性欲,而只说“认知叙事学,跨媒体叙事学,以及以国家或历史为主线的叙事性”<sup>④</sup>。在介绍认知叙事学时,杨写道:

以心智为基础的叙事理论,从某种方式来说,远离了经典叙事学的动向,因为它们讲究语境,研究跨媒体,关注有利于解读的过程和线索。正如库科宁所指出的,“认知叙事学传统上不考虑性别观点……,因为‘男性’和‘女性’大脑的性别化大有问题”;这问题如此之大,以至于事实上,《叙事学活用手册》宣称,即使是“致力于这一研究领域问题的人,

也不一定认为他们的研究是认知叙事学的,甚至可能抵制与此相关的方法”。(Young, 2018: 919)

这里,杨所说的库科宁的文章,就是该专刊中的《移动的目标》。文中,库科宁“提出一种女性主义的认知叙事学的方法,其基础是最近的具身认知研究”,所针对的是这一误区,即“认知叙事学传统上不考虑性别视角,原因有种种”,其中之一便是认为,认知过程 and 大脑结构非常复杂,“难以确定”,如此,“性别就似乎成了超出认知范围的移动目标”<sup>⑤</sup>。倘若认知叙事学“赞同”男女性大脑本质上存有差异,那就“很难避免”“神经学性别歧视”(neurosexism)(Kukkonen, 2018a: 973)。库科宁运用具身女性主义叙事学,分析了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的短篇小说《刺杀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这篇文章中,她注意到,沃霍尔在与赫尔曼等人合著的《叙事理论:核心概念和批评辩论》一书中写道,“女性主义叙事理论……与认知叙事学的共同点最少”,但在书的末尾,代表认知叙事学的赫尔曼却提议说,“‘后笛卡尔’的具身认知方法,可以反驳沃霍尔的这一观点,即认知叙事学的‘普遍性……忽视身份地位所产生的差异’”。对于赫尔曼的这一“提议”,库科宁似乎不是满心欢喜:她认为“赫尔曼只停留于这种姿势,这或许是因为他所引用的具身认知中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尚未在他们的阐述中思考性别视角。但是,对于我来说,有一种相关方法,的确可与女权主义叙事学进行对话,更可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进行普遍的对话。这种相关方法,就是作为概率和预测的具身过程的当下认知视角”(Kukkonen, 2018a: 973, 975)。

非常有趣的是,2018年《爱丁堡当代叙事理论指南》也收录了库科宁的一篇文章,即第一部分的第四篇《完全延展的大脑》(“The Fully Extended Mind”)。文中,她提到所谓的“笛卡尔的错误”,即心与物的绝对分离,而当今的认知是“后笛卡尔”式的,认为心与物绝对紧密相连。她说:“我们的思想源于我们的身体,受到其运动和姿态的影响,由其身体和情绪状态

的体验所滋养,通过他人身体、运动和体验的所谓运动共振与他人思想相联系”(Kukkonen, 2018b: 56)。这就使大脑(或说心)得以延展,即成了“延展的大脑”。她引用克拉克的话说,“认知渗透到身体和世界”<sup>⑥</sup>,她称这种新的认知为“4E认知”(4E cognition)<sup>⑦</sup>。

《指南》中,库科宁之后的那篇文章,即第五篇文章,是由梅里亚·波尔维宁(Merja Polvinen)所写,题曰《理解和惊奇:推理小说叙事形式的生成认知方式》。文中,波氏一开始就提出,“文学历史中向来有些理论,把自我反思视为文本人为性的自然组成部分”,而且认为文本自我反思问题,可借用认知视角,尤其是生成认知视角来解决。对生成认知和标题中的“理解和惊奇”,她是这样解释的:

生成认知是具身认知,而非抽象计算,而且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具身形式,生成了它所处的环境……在这一背景下,理解意味从事认知的人自行建构一个意义世界,用雅克布·冯·宇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的话来说,是建构一种“环境因素”(Umwelt)。在这一充满意义的环境中,相关性处于不断变化当中,既依赖于认知者的行为种类,也依赖于环境中可用的可供性(affordance)类型。我以为,认知生成框架,让我们理解科幻小说的叙事性文学化过程为何可能特别有趣……因此,我标题中说的“理解和惊奇”,一方面,是指把理解视为生成,视为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读者通过阅读而赋予行动,以此而生成认知环境;另一方面,是指科幻小说中特定推理元素,把惊奇和体验融合起来的方式。(Polvinen, 2018: 68)

纵观女性主义叙事学近40年的发展史,我们的确看到,它“依旧不是一种单一或说独特的叙事学工程”(Young, 2018: 913),所走的是一条跨学科的道路,也正因为如此,才能越走越强、越走越宽,不管其目标如何移动。至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同一时代发展迅猛的修辞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并驾齐驱,成为后经典叙事学最为重要的三个分支之一

(宋杰, 2021: 130)。而研究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学者,也须以跨学科的方式来研究它,如此方能看清和评价其成就或不足。

#### 注释:

①此文旨在评论四本论文集:(1)《酷儿土著研究》(Queer Indigenous Studies, 2011),由Qwo-Li Driskill等人合编;(2)《种族主义的性生活》(The Erotic Life of Racism, 2012),由Sharon Patricia Holland撰写;(3)《奇怪的亲密关系》(Strange Affinities, 2011),由Grace Kyungwon Hong和Roderick A. Ferguson合编;(4)《酷儿(不)公正》(Queer(In)Justice, 2012),由Joey L. Mogul等人合编。

②《叙事理论:核心概念和批评辩论》(Narrative Theory: Core Concepts and Critical Debate, 2012)一书中的“四种叙事研究方式”,是指由赫尔曼所代表的认知叙事学,费伦和拉比诺维茨所代表的修辞性叙事学,里查森所代表的非自然叙事学以及沃霍尔所代表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他(她)们都是该书的编者,就叙事学的某些传统概念,如叙事、隐含作者、人物等,以及叙事价值和美学价值,四种叙事研究方式的差异、叠合和互补陈述了各自的见解。详见:David Herman, James Phelan, Peter J. Rabinowitz, Brian Richardson, and Robyn Warhol(eds.). Narrative Theory: Core Concepts and Critical Debates.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2.关于他们之间的见解之评论,可参见:胡全生.2020.女性主义叙事学与修辞性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的关系[J].外语与外语教学(1):120-128.

③《叙事学活用手册》的基础是《叙事学手册》,2009年第一次出版,第二版修补、扩充于2014年。之所以称“活用的”,乃是因为叙事学的动态本质。2013年9月,David Herman对“认知叙事学”这一词条作了修改和提升。他解释说,认知叙事学“依然是叙事学广泛领域中新兴的趋势”(Herman, 2013)。

④奥尔森的《当前叙事学趋势》分成三个部分,即(1)叙事和心智;(2)跨媒体的、跨文类的和跨学科的叙事研究;(3)叙事的历时视角下的地方和国家方法:走向比较叙事学。没有把女性主义叙事学当作一种“单一或说独特的叙事性工程”,换言之,是把女性主义叙事学只当作一种跨学科叙事学。请参阅:Greta Olson(ed.).2011. Current Trends in Narratology.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⑤笔者以为,库科宁所说的“移动目标”是借用了兰瑟的

措辞。兰瑟在其2010年的文章中,在回答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否到达其目标时,答曰“到达了那里”却“不在那里”,因为“那里”是个“移动的目标”,不是最终的目的地,“还有更多的事要做”(Lanser, 2010: 33)。换言之,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一项不断拓展的工程。

⑥此话语出自克拉克撰写的专著《超级大脑:具身、行动和认知延展》(Clark, 2008: xxviii)。

⑦4E代表 embodied(具身)、embedded(嵌入)、extended(延伸)和 enacted(生成),在英文中均以字母e开头,可称其为一种融合认知,因为它将身体(或说大脑)与社会、文化、历史等语境综合起来认知。

#### 参考文献:

[1]胡全生. 2020. 女性主义叙事学与修辞性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的关系[J]. 外语与外语教学(1): 120-128.

[2]申丹,韩加明,王丽亚. 2005. 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申丹,王丽亚. 2010. 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宋杰. 2021. 西方认知叙事学研究的主要议题[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32(5): 130-142+160.

[5]Allrath G, Gymnich M. 2005. Gender Studies[C]//Herman D, Jahn M, Ryan M(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4-198.

[6]Clark A. 2008. Supersizing the Mind: Embodiment, Action and Cognitive Extens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Crenshaw K. 1989. 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J].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Special Issue)(140): 139-168.

[8]Crenshaw K. 1991. 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J]. Stanford Law Review, 43(6): 1241-1299.

[9]Davis K. 2008. Intersectionality as Buzzword: A Sociology of Science Perspective on What Makes a Feminist Theory Successful[J]. Feminist Theory, 9(1): 67-85.

[10]Dinnen Z, Warhol R(eds.). 2018. 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Narrative Theorie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1]Falx J. 1990. Postmodernism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Feminist Theory[C]//Nicholson L(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39-62.

[12]Hames-García M. 2013. What's After Queer Theory? Queer Ethnic and Indigenous Studies[J]. Feminist Studies, 39(2): 384-404.

[13]Herman D. 2013-09-22. Cognitive Narratology[J/OL]. Hühn P, et al.(eds.). The Living Handbook of Narratology. Hamburg: Hamburg University Press. <http://www.lhn.uni-hamburg.de/>.

[14]Herman D, Phelan J, Rabinowitz P J, Richardson B, Warhol R(eds.). 2012. Narrative Theory: Concepts and Critical Debates[M].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5]Knutson S. 2000. Narrative in the Feminine: Daphne Marlatt and Nicole Brossard[M].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16]Kukkonen K. 2018a. A Moving Target- Cognitive Narratology and Feminism[J]. Textual Practice, 32(6): 973-989.

[17]Kukkonen K. 2018b. The Fully Extended Mind[C]//Dinnen Z, Warhol R(eds.). 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Narrative Theori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56-66.

[18]Lanser S. 1986. 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J]. Style, 20(3): 341-363.

[19]Lanser S. 1992. Fictions of Authority: 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Lanser S. 1995. Sexing the Narrative: Propriety, Desire, and the Engendering of Narratology[J]. Narrative, 3(1): 85-94.

[21]Lanser S. 1996. Queering Narratology[C]//Mezei K(ed.). Ambiguous Discourse: Feminist Narratology and British Women Writers.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50-261.

[22]Lanser S. 2010. Are We There Yet? The Intersectional Future of Feminist Narratology[J].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2(4): 32-41.

[23]Lanser S. 2014. Gender and Narrative[Z]. Hühn P, et al. (eds.). Handbook of Narratology(2nd Edition). Berlin and 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206-218.

[24]Lanser S. 2015. Toward(a Queerer and)More(Feminist)

Narratology[C]//Warhol R, Lanser S(eds.). *Narrative Theory Unbound: Queer and Feminist Intervention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3-42.

[25]Lanser S. 2018a. Queering Narrative Voice[J]. *Textual Practice*, 32(6): 923-937.

[26]Lanser S. 2018b. Till Death Do Us Part: Embodying Narratology[C]//Dinnen Z, Warhol R(eds.). *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Narrative Theori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17-131.

[27]McGarry M, Haggerty G E. 2007. Introduction[C]//Haggerty G E, McGarry M(eds.). *A Companion to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er Studies*. 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1-14.

[28]Nash J C. 2017. Intersection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J]. *American Quarterly*, 69(1): 117-129.

[29]Nünning A. 2003. Narratology or Narratologies? Taking Stock of Recent Developments, Critique and Modest Proposals for Future Usages of the Term[C]//Kindt T, Müller H(eds.). *What is Narratology?*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39-275.

[30]Olson G(ed.). 2011. *Current Trends in Narratology*[M].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31]Polvinen M. 2018. Sense-Making and Wonder: An Enactive Approach to Narrative Form in Speculative Fiction[C]//Dinnen Z, Warhol R(eds.). *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Narrative Theori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67-80.

[32]Warhol R. 1986. Toward a Theory of the Engaging Narrator: Earnest Interventions in Gaskell, Stowe, and Eliot[J]. *PMLA*, 101(5): 811-818.

[33]Warhol R. 1989. *Gendered Interventions: Narrative Discourse in the Victorian Novel*[M].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34]Warhol R. 1992. The Look, the Body, and the Heroine: A Feminist-Narratological Reading of Persuasion[J].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26(1): 5-19.

[35]Warhol R. 1996. The Look, the Body, and the Heroine of Persuasion: A Feminist-Narratological View of Jane Austen[C]//Mezei K(ed.). *Ambiguous Discourse: Feminist Narratology and British Women Writers*.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1-38.

[36]Warhol R. 2005. Feminist Narratology[C]//Herman D, Jahn M, Ryan M(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161-163.

[37]Warhol R, Lanser S(eds.). 2015. *Narrative Theory Unbound: Queer and Feminist Interventions*[M].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38]Young T. 2018. Futures for Feminist and Queer Narratology[J]. *Textual Practice*, 32(6): 913-921.

## The Interdisciplinary Trajectory of Feminist Narratology

Hu Quansheng

**Abstract:** Even in the 21st-century, feminist narratology "is still not regarded as a separate or distinct project in narratology", but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 Its developing trajectory is one that is born, extended, and magnified interdisciplinarily or transdisciplinarily, and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interdisciplinary stages, namely, the birth stage-gender intervening(1986-1995), the queering stage-queer rising(1996-2005), the extending stage-intersection deepening(2006-2017), the magnifying stage-embodied cognition expanding(2018-present). As Lanser wonders, the future of feminist narratology could "have a transformative place" as "the body intrudes itself in new and not always welcome ways", or as the subtitle of her text indicates, it could have an "embodying narratology".

**Key words:** feminist narratology; developing trajectory; interdiscipline; embodied cognition